试论中央苏区时期《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张红春[1]，　罗　芒[2]
(1. 赣南师范学院 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2. 九江职业大学 思想政治教研室，江西 九江　332000)

摘要：《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中央苏区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相关报道在《斗争》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内容涉及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民主建设、廉政建设等方面。探究《斗争》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之关系，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央苏区时期；《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4)05－0101－06

On *Struggl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NG Hongchun[1]，　LUO Mang[2]
(1.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Gannan Normal University，Ganzhou，Jiangxi 341000；
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Jiujiang Vocational College，Jiujiang，Jiangxi 332000，China)

Abstract: *Struggle* was the mouthpiece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the relevant repor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self occupied a large proportion of *Struggle*，and its content was related to the Party's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style，democracy，clean government，etc.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gg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self and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 in the new period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 *Struggle*; development of the CPC

《斗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机关理论刊物。1933 年 1 月创刊于上海，1937 年 3 月停刊于延安。共出版了 206 期，约 700 万字左右。《斗争》的出版可分为两个时期、三种版本。第一时期为 1933 年 1 月至 1935 年 7 月。这一阶段分别在上海和江西瑞金出版了两种版本。《斗争》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在上海出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后，上海中央局及上海临时中央局仍以中央名义继续在上海出版。从 1931 年 1 月 21 日创刊至 1935 年 7 月 5 日停刊，共出版 79 期。此版为 32 开油印本，是为第一种版本，通称上海版。在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瑞金后，又出版《斗争》，作为苏区中央的机关报。从 1933 年 2 月 4 日的第 1 期至 1934 年 9 月 30 日的第 73 期，共出版了 73 期。这一版为铅字印刷本，是为第二种版本，通称苏区版。长征期间，《斗争》报停了一年零一个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恢

收稿日期：2014－07－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编号：13CDJ002)
作者简介：张红春(1970－)，女，江西九江人，法学博士，赣南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罗　芒(1987－)，女，江西九江人，九江职业大学讲师。

复出版,进入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的机关刊物,在保安出版,从第 74 期(1935 年 11 月)至第 102 期(1936 年 6 月),共出版 29 期;第二阶段改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在延安出版,从第 103 期(1936 年 6 月)至第 127 期(1937 年 3 月),共出版 25 期,合计为 54 期。均为刻印本,是为第三种版本,通称西北版。本文所述的《斗争》报,特指 1933 年 2 月至 1934 年 9 月,苏区版的《斗争》报。

1931 年 1 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成立,且办有机关报《战斗》。1932 年 2 月《战斗》改名为《实话》。同年 6 月,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出版《党的建设》。《斗争》苏区版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是在将《实话》与《党的建设》合并而成的基础上创办的。原因是:这两种刊物,"均不能按期出版,而且内容方面还有很多缺点,致不能完成党的机关报的领导作用"。[1] 《斗争》自创刊后,在内容方面力加改良,尤其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更为关注,就其刊登的多篇文章来看,几乎涉及到党建的方方面面。学界从《斗争》的视角来解读其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的论文极少①,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期待本文能为后来居上的专家、学者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党的组织建设:强调干部培训与支部作用

中共是强调组织严密的革命党,党的组织在革命中发挥着核心力量。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积极宣传党组织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理应是其应尽之责。党报《斗争》的主要负责人及撰稿人是洛浦(张闻天)、罗迈(李维汉)、陈云、博古(秦邦宪)、凯丰(何克全)、毛泽东、杨尚昆、邓颖超、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瞿秋白、王稼蔷(王稼祥)、刘伯承、亮平(吴亮平)等人,他们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精神,文化修养深,理论水平高,他们对国内外局势的通盘考虑和苏区革命及党建的现状分析,是远远超过他人的。所以通过他们撰写的文章,《斗争》报能起到指导党组织建设的作用。

党组织发展的快慢其衡量因素之一即是党员人数的多少。据福建中共党组织统计,1930 年 3 月福建省党员总数为 1318 人。[2](P146) 随着闽西苏区的开辟、发展,闽西地区党员人数迅猛增长,1933 年 6 月达到 20000 人。而更令人惊喜的是,就一个红五月(1933 年 5 月)征收党员运动,"在江西都获得了二万新党员"。[3] 对这一可喜的现象,《斗争》进行了及时的报道。

党组织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数量的党员,而决定党组织坚强与否的要素则应该是党员的质量。提高党员质量的途径之一便是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随着中央苏区的不断发展,各级党员教育机构纷纷设立。如:中央党校、苏维埃大学、列宁团校等。同时,各种短期训练班也相继开办,这对党员随时随地接受教育、训练,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1933 年 9 月,就党内教育计划问题,《斗争》刊登了《中央组织局给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在该来信中,中央组织局要求各级党委把举办各类短期培训班作为培训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每个县委应该举办支部干事的专门训练班,如支书训练班、组织干事训练班等,使每个干事都受到专门训练。""要定期的举办流动训练班,实行不让一个新党员没坐训练班的口号。对于那些新成立的支部,县委首先要办专门训练支部书记和干事的训练班,以便本地的干部能迅速代替外来的干部。"[4] 由于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大规模发展工农入党,提拔他们进入领导部门,是其明确自己阶级属性的必由之路。为此,中共投入相当精力(如办党校、办各种干部培训班等)提高党员干部素质。经过努力,一批新干部迅速成长。据《斗争》报道:1933 年 5 月,江西县一级 419 个干部中,"工人成分 192 个,占 46%;贫农 184 个,占 44%。""419 个干部中有 303 个可以统计的,从支部工作调来的 51 个,任过区级工作的 197 个,总共占 81%。""419 个干部中参加过游击战争或暴动的,有 185 个,占总数 44%。"[5]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工人、农民成为干部的主体;参加过游击战争或暴动的干部为核心;同时大批提拔新生干部,实行新老干部的交替。《斗争》报认为这些经过培训的、提拔的新干部

① 查询中国知网及超星,相近的仅查到一篇论文,即赣南师范学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李霞的毕业论文《<斗争>与苏维埃革命》。在其论文的第三章涉及到这方面内容。

充实到各级机关后，对提高干部的素质及其忠诚度，严密组织，加强中共党组织和干部体系的领导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从支部起——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增加党的领导作用，”[6](P635－636)是中共的头等大事。由此看出，中共非常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尤其是支部的建设，并在《斗争》上对苏区各地的支部建设进行了指导。支部建设的重要性正如《斗争》报中所刊登的“共产党的支部是党在群众中的核心”。因为它既是链接党与群众的桥梁，又是“党教育党员，训练干部的基本学校。”[7] 1932 年 3 月底，兴国等 15 县共成立支部 998 个，差不多支部遍布每个乡。[8](P661)《斗争》对各地支部的建设进行了详细的指导和说明。像“离支委远的村庄，可以由几个村庄成立一个支分部；支分部下以村为单位成立小组，支分部干事会应设在党员人数最多的村庄；支委附近村庄的小组，一般的由支委直接管理，只有小组过大的村庄，为人数在十人以上，可成立支分部下面不设小组。”[7] 通过《斗争》的具体报道，可以看出中共党组织的严密性。

二、党的作风建设：注重实践与群众路线

党风问题是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说：党的作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9](P813)其实质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处理不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党领导革命事业的成败。具体表现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作为中央苏区的机关报《斗争》，及时刊登这一时期党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解决的方法，应是它必由之举。

一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毛泽东说“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0](P13)其实质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获取对某个问题的正确认识。针对当时中央苏区地方苏维埃政府机关中存在的敷衍塞责、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斗争连续刊登了苏区领导人撰写的乡苏怎样工作和区苏怎样工作等文章，批评了错误思想，提倡在政权建设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

《斗争》指出“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与市苏，”“不了解乡苏和市苏的工作，简直就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的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个问题。”这些上级苏维埃政府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理论水平或许很高，可以发得出很多的命令、决议，但却不清楚任何一个乡苏维埃、市镇苏维埃的实际工作，这样没有实践内容的理论只能是空洞的理论。这种行为“是官僚主义，”也“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面对这个问题，该如何迅速有效地去解决呢？文章接着指出：我们要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具体的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11] 1934 年初，《斗争》上刊登毛泽东的《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①一文同样体现了此观点。注重实地调查、理论联系实际，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原则，为苏区的党风建设提供了权威性的理论指导。

二是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群众路线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苏区时期，有些党员干部、领导在工作作风上存在个人包办一切、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针对这种不正之风，中央苏区政府提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工作方式的转变，以改善党的领导，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在该问题上，《斗争》给予了密切关注和适时指导。如分别在第 2、5、20、28 期上刊登张闻天的《关于新的领导方式》。文中就苏区党的领导机关、政府领导机关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内普遍存在的个人包办一切，缺乏集体领导的不正常现象提出严厉批评，强烈要求建立巡视员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既可以使上下级关系活跃起来，又可以使党的上级领导机关真正能细心领导下级的干部，加强对下级的领导。从而形成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制度，使每个机关工作人员分工明确、有事可做、遇事能商量的新气象。在如何落实具体领导群众工作问题上，张闻天认为，应该“细致的耐烦的去说服群众，正确的去代表群众的意见，负

① 《斗争》报第 45 期，1934 年 2 月 2 日。

责的谨慎的去领导群众”[12]。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如何正确领导群众的艺术。上述观点和举措,对中央苏区转变领导工作方式,提倡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作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

三、党的民主建设:重视党内民主

作为中共的第一次建政尝试,苏维埃政权非常强调党的民主建设。在肯定阶级分化的基础上,人民民主建设一直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共的这种民主理念,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就开始了探索和实践。

“苏维埃的民主,首先表现于选举运动。”[13](P355) 早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改选之前,《斗争》就民众选举问题进行了方向性的指导。它说,党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去发展自身民主建设,首先在查田运动、阶级斗争、政治动员中,吸收每一个苏维埃选民,参加选举。“必须在选举之前一个礼拜,将候选人的名单提到群众中去讨论,使每一个选民对每一个候选人有审查,考察,与发表意见的机会,”如果选民对此候选人不满意,应该鼓励群众推选出更好的候选人,同时在改选之前,各级苏维埃必须向选民做他们的工作报告,这种报告必须在选民中讨论,鼓励他们对报告发表意见,“使他们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苏维埃的主人翁,只有他们有权选出或撤回他们自己的代表。”同时,在关于“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上,《斗争》也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它认为,工农民主专政是对地主残余,资本家富农等少数人的统治,而对于广大的工农民众则是最大限度的(民主主义的意思)。“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的中心任务,是吸收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政权,教育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参政问题,《斗争》的观点既明确又有创新,表现在:由于政权只是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全民众的专政,所以享有选民资格的只能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态度坚定且明确;但面对苏维埃政权的周围还有一部分民众并未参加政权,我们可以用一切方法吸引他们积极参政议政。我们可以采用说服和教育的方法,帮助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成长,锻炼和教育他们,使他们在无产阶级先锋的领导下为苏维埃政权的发展和巩固而斗争。“使苏维埃政权变为最广大民众的政权”[14]。这不能不说是《斗争》在党的民主建设方面的大胆创新。

《斗争》刊登的这篇文章是在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文章中提到的关于公民使用“改选权”和“召回权”(即罢免权)问题,关于“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参政的态度问题等等,对 1933 年 12 月苏维埃大会的改选及决议案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提高了苏区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可以说,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开了赣南、闽西地区群众意志表达方式之先河”。[15](P120)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中国共产党是生活在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度中,党内存在不良作风不足为奇。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敢于面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勇于纠错、改错。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作主要体现在:

第一、“没有下文的空洞计划”。① 针对 1932 年 10 月 27 日福建军区政治部发的四号训令上的扩红计划(三个月内不但要完成上级交代的七千红军,而且还要超过计划一万五千人,直到发文的 1933 年 2 月都没有落实。)和筹备战费(立即准备半年战费 60 万元,从此,无下文。)之事,中共中央在其机关报《斗争》上登报点明批评。在发展党员方面,也登报批评了福建新泉县委。文章指出:省委规定到 1932 年年底发展党员 600 人,但完成的党员人数只有 50 人。“这完全是发展党的关门主义。”在发展党员方式上,“仍就是一种拉夫式”,“甚至还有不经过入党手续而加入的。”[16] 最后编者说,希望这些被批评到的各级党组织,能尽快地拿出解决方案去纠正那些不正之风。因为,开展自我批评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党的工作的彻底的转变。

第二、“平均主义是具体领导最凶恶的敌人”[17]。《斗争》指出,虽然中央苏区在倡导新的领导方式

① “自我批评”栏目,《斗争》第 2 期,1933 年 2 月 4 日。(原文中写的是 1933 年 2 月 4 日与第 1 期的时间相同。按照“《斗争》初为旬刊,后改为周刊”的说法,这里应该是个刊误,第 2 期的出版时间应为 1933 年 2 月 14 日 “《斗争》初为旬刊,后改为周刊。”参见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3 页。

和新的工作方法中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些人的顽固、守旧观念的彻底清除。在具体领导上，有些人没有区分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没有把整体与个体区分开来，因此，他们在做动员时就会出现重复的语句。“这种毫无内容的皮相的形式主义，这种毫无益处的革命空话，”[17] 是担负不起革命的重任的。我们应该依据每个人的知识程度，从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有的放矢的完成任务。

第三、“克服锦标主义的革命竞赛”[18]。为了加速党的工作，加紧争取战争胜利的动员，中央苏区在各地运用和开展了革命竞赛活动。由于部分党员同志没有真正理解革命竞赛的真正含义，因此，在竞赛总结与评判大会上出现争分数、争等级、说风凉话、怀疑优胜者的报告不忠实等现象。为此，《斗争》对中共党自身作出自我批评。认为，这一切表现出“我们支部的最大多数同志，对革命竞赛的真义与怎样正确运用，还没有了解”，“对于同志们的深入与个别教育史极端的缺乏”[18]。竞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迅速执行党的决议、提高每个党员的工作积极性，达到积极的带动落后的，落后的学习积极的，警惕自己的落后而要求进步。绝不是为了竞赛而“竞赛”！

四、党的廉政建设：严惩贪污腐败

廉洁政治的重要一环就是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苏区时期，选举尚难成为苏维埃政权自我监督的有效方式。为此，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一整套的监督机制。各级党组织设立监察委员会，各级政府设立工农监察部和工农控告局，负责对干部进行监督。为了保证群众有效参与对干部的监督，各级工农监察部组织“轻骑队”①等，对各级部门进行检查、监督。为此，《斗争》对“轻骑队”的职责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即“轻骑队”的主要任务是“检查苏维埃机关、企业内、经济的和合作社的组织内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腐化、消极怠工等现象，举发对于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执行的阻碍与曲解。”[19] 他们通过明察暗访，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对此，《斗争》把报告的结果进行了及时的宣传和报道，起到了发动群众参与监督的作用。

当时，腐败最严重、最具有警示意义的是“于都事件”。1934 年初，中共中央在检查工作时，发现于都各级干部贪污严重。据《斗争》报道于都“县军事部长刘士祥等造假账向动员武装部冒领公款 410 余元。县苏主席熊仙璧以主席名义私拿公款 50 元，回家做资本”[20] 以及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包庇熊仙璧的错误，利用职权，拉股经商，谋取私利等等。对此，苏维埃政府作出撤职甚至判处死刑的严肃处理。《斗争》对案件处理过程和事件的性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结语

党的建设关乎着党的命运。《斗争》作为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和窗口，担负起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责任。尤其是在推动党的建设方面，刊登了 40 多篇文章，从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民主建设到廉政建设，充分肯定了中共在这块“试验田”的第一次建政尝试，书写了中共历史上的民主范本。《斗争》通过刊登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罗迈、凯丰等苏区主要领导人的文章，使《斗争》成为指导苏区党建最有权威性党报。《斗争》站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介绍党的组织理论，开展党内生活的讨论，帮助党在实际工作中的转变，这对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可以相当充分地开展党内的批评，可以真正做到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真正落实了选民的“改选权”和“召回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创了“权为民用”的先锋。《斗争》通过苏维埃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和民众及舆论的外在监督给予权力腐败以严厉控制，这些都为中共的廉洁政治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斗争》虽然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斗争》宣传的“中共当年在有限时间和条件下作出的有益尝试，仍然值得后人认真总结、谦虚面对。”[15](P126)

① “轻骑队”是青年团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最早成立于 1932 年。

参考文献:
[1] 党报委员会的通知[N]. 斗争,1933 - 2 - 4.
[2] 福建组织状况统计表(1930 年 3 月 8 日)[B]. 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 册)[Z]. 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6.
[3] 罗 迈. 红五月征收党员的结果与教训[N]. 斗争,1933 - 8 - 5.
[4] 中央组织局给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N]. 斗争,1933 - 9 - 5.
[5] 罗 迈. 把提拔新的干部当作组织上的战斗任务[N]. 斗争,1933 - 9 - 5.
[6]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 年 11 月)[A].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Z].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7] 罗 迈. 健全支部生活的几个中心问题. 斗争. 1933 - 4 - 25.
[8] 区委支部统计表(1932 年 3 月底止)[A].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Z].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0] 毛泽东.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
[11] 毛泽东. 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N]. 斗争,1934 - 1 - 12.
[12] 张闻天. 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三)[N]. 斗争,1933 - 8 - 5.
[13] 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33 年 12 月 28 日)[A].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 ~ 1934 年)[Z]. 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7.
[14] 张闻天. 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N]. 斗争,1933 - 8 - 12.
[15] 黄道炫. 张力与限界: 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 ~ 1934)[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6] 炳. 没有下文的空洞计划[N]. 斗争,1933 - 2 - 4.
[17] 凯 丰. 平均主义是具体领导最凶恶的敌人[N]. 斗争,1933 - 5 - 1.
[18] 小 超. 克服锦标主义的革命竞赛[N]. 斗争,1933 - 5 - 1.
[19] 轻骑队的组织与工作大纲[N]. 斗争,1934 - 1 - 5.
[20] 张闻天. 于都事件的教训[N]. 斗争,1934 - 3 - 31.

(责任编辑: 吴 赘)